

傅雷致巴金四封信简浅疏

周立民

多年以前，读柯灵怀念傅雷的文章，里面提到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原稿中，曾有一段话批评巴金。傅雷的孤傲脾气，人所共知，读过柯灵的文章后，更令我有一个印象：傅雷与巴金虽同在上海，可能交往并不多。

后来，我发现傅雷1950年代初的译作大都是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立即意识到我之前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傅雷在平明社出版的译作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还有梅里美的《嘉尔曼附高龙巴》……都是傅雷精品。那也正是傅雷作为翻译家最为成熟的时候，傅雷说：“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傅雷1951年4月15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191页）如此呕心沥血译出的作品，傅雷能够把它们交给一个创办不久、实力一般的民营小出版社出版，这是多大的信任啊。虽然在现有的傅雷传记资料中，很少有提到他与巴金的交往，可是，我认为这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公布，我也找到不少傅雷与巴金两个人交往的线索。如1957年，傅雷曾托巴金给周扬带过亡友、作曲家谭小麟的乐谱和胶带等，倘非可以信赖之人，又怎么能托带东西？1955年、1957年，傅雷对出版、发行工作提意见的时候，能够看出他的很多想法与巴金一致，他还曾直接提到过巴金，说明有的问题两人有过交流。巴金这一面，1963年1月15日、19日日记中记过，他与傅雷互赠新书。1973年，在傅雷还未平反，巴金也是戴罪之身，巴金却肯定了傅雷的译文：“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文译本我过去很少买（我例有法文《人间喜剧》全部）。……傅雷的译本比别人译的好得多，据说还有一两种他的译稿，最近有可能出书，不知是真是假。”（巴金1973年12月2日致黄源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3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在1978年8月、9月，傅雷的儿子傅敏给巴金寄过书，两人还有书信往来……

经历过特殊岁月之后，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高度评价傅雷的言行。《随想录》第一四六篇《二十年前》中，巴金提到傅雷，赞扬他：“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巴金：《二十年前》，《巴金全集》第16卷第6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巴金称傅雷是自己的一位“亡友”。那一辈人，不会轻易地称别人为“朋友”的……凡此种种，说明他们交谊匪浅，只是我们所知不多。

二

很幸运，傅雷致巴金的四封信保存下来了，虽然有的仅是片言只语，但是，巴金与傅雷的交往的更为具体的内容浮出水面。

其中有两封短简，是傅雷致巴金送音乐会的票子：

巴金先生：
附上民进晚会入场券二纸，音乐节目约八时开始。勿此即候
傅雷 拜上
元月一日（1953年1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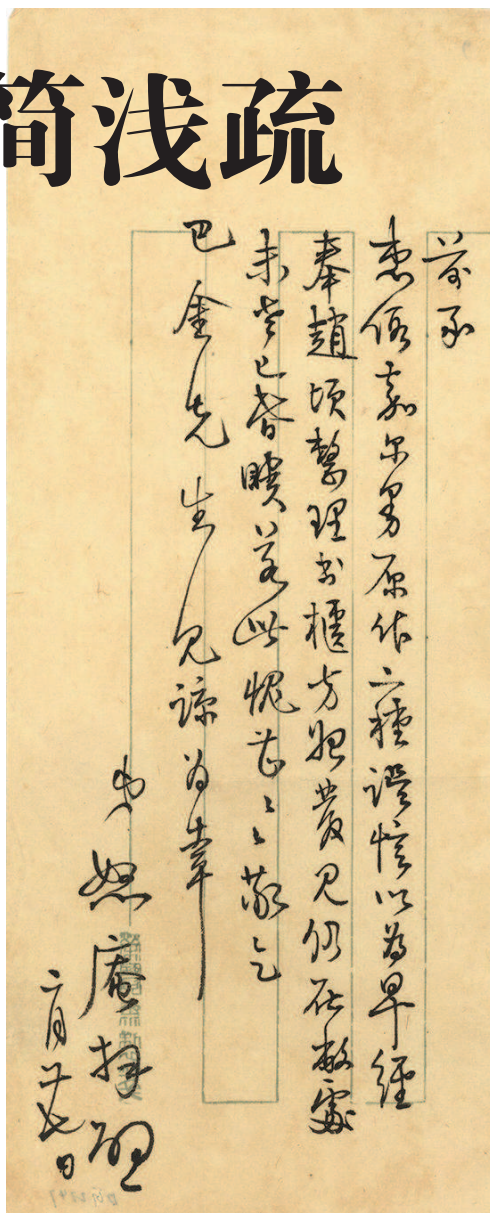
贝多芬纪念音乐会（有小儿参加演奏钢琴协奏曲）本定廿六、廿七、廿八连续举行三场，二小时内座券全部售完，故加演卅日一场。票子仍极难得，请注意时间为下午四时三刻。

兹附券一张 即希察收为幸
此候
李太太 时媛
巴金先生前致言

傅雷 廿五日
（1953年3月25日）
儿子学习音乐，傅雷与音乐界有着



傅雷夫妇一九六五年摄于书房



傅雷致巴金（手迹）

广泛的交往，送票给巴金，让朋友欣赏儿子的演奏，在傅雷，一定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儿子傅敏是傅雷另一件精彩的作品，《傅雷家书》中，这位严厉的父亲对儿子的爱也感动了万千读者。有意思的是，傅雷与巴金在国外竟然有一次邂逅。“你出国途中，在莫斯科遇到巴金先生；他在八月中旬回到上海，当天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而你却从来没提及。当然，那一段时间你是忙得不得了，无暇作那些回想。”（傅雷1954年9月28日致傅聪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4卷第84页）1954年7月13日至8月4日，巴金在莫斯科出席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21日起去雅尔塔等地访问。莫斯科相见，应当是在7月中旬那一周吧。巴金回国后，立即给傅雷打了电话，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交往的密切。

三

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翻多了，傅雷想换换口味，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以后想先译两本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换换口味，再回到巴尔扎克。”（傅雷1953年2月7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208页）《嘉尔曼附高龙巴》，平明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印数为一万册。傅雷翻译用的底本（或参考本）借自巴金，于是便有了傅雷这封还书帖：

前承
惠赠《嘉尔曼》原作二种，译忆以为早经奉过，顷整理书柜，方始发现仍在敝处。未老巴昏愤若此，愧甚愧甚。敬乞
巴金先生 见谅为幸
弟 傅雷 拜上
二月二十七日
（傅雷1954年2月27日致巴金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226页）

梅里美，傅雷译作“梅里曼”，对这个译法，巴金在给妻子的信里表示过不同的看法：“这两天在这里看了好些书，采臣寄来的书大半都看过了。梅里美的东西不错。傅雷译文还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译作梅里曼，我颇不赞成，因为嘉尔曼和梅里曼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拼音。‘育才’照原来的音应该是‘何塞’。”（巴金1953年11月5日致傅聪信，《巴金全集》第23卷第3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颇不赞成”，然而印在书上的依旧是“梅里曼”，说明平明社和巴金不以己见为尺度，尊重傅雷。

傅雷与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这基于作为文化人的巴金对文人个性、习惯的尊重，他放手让傅雷按照自己的标准、个性去译书和处理稿件。这一点，傅雷跟朋友们提起甚至不无得意，他说是“为所欲为”：“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编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书均由巴金办的‘平明’出版，我可视为所欲为。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

鞭长莫及，只好对自己的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傅雷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39页）

限于条件，平明社的精装本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平明社的工作作风却给傅雷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对人文社的领导说：“将来倘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印精装本的话，希望注意一点：就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国营的出版社成绩，决不能低于几年以前的私营出版社。”（傅雷1956年12月10日致王叔叔、楼适夷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322—323页）

他对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直接提出硬性要求，第一条就是要保留平明社印本的“旧样式”。傅雷的要求处处以平明社的书和做法为标准，由此观之，可以想象，他和巴金的合作之默契和满意度。至于他一再提到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同前，第318—319页）的确实，这套书的印装在今天看来也是难得的精品。四大卷，开本近乎方型，书封有外函套，封面简洁、经典。在普通本之外，平明社还有给作者加印特装本的，让作者送人，也体现书的尊贵。黄裳、穆旦、萧珊的书，我都见过这种特装本。

文人爱书，傅雷很珍惜这样的印本，在给儿子的信中也叮嘱：“新出的巴尔扎克，收到后来信提一笔——这是特印非卖本，勿随便借出去，搞丢了！”（傅雷1954年4月7日致傅聪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4卷第46页）“特印非卖本”这并不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在计划经济中，国营大社怎么会有这种例外，反倒是私营出版社有这种灵活性。还有一层不能忽视，巴金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他懂文人的情趣和需要。

四

平明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延续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译文丛书”的路子，编辑“文学译林”丛书，意在推出翻译精品，傅雷是第一批受邀加入的作者，他一直关注平明社这套丛书。“西不谈及巴金新书一书店（已与文化生活分家），想专出一套最讲艺术的文艺翻译，由西不与他二人合编，说是决不马虎，迄今只收了杨绛一本译稿，听说说好得很。此外又来向我约稿，也许新译的巴尔扎克会给他们。……但书店方面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巴金的条件，仍是百分之五的版税，他是反对新办法的。”（傅雷1952年3月20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221—222页）“《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不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阻四，弄得别种新义的丛书不成了。”（傅雷1951年9月14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201页）这两封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文学译林，由巴金和陈西不合编；第一批稿件中只有杨绛译《小癞子》和傅雷译《贝姨》。傅雷特别强调巴金他们收稿之“严”“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严格、标准、眼光，巴金的出版社的这些品格都是傅雷看重的，这也是傅雷与巴金两个人作为朋友最重要的精神联系点。

傅雷还是一个热心人，他鼓励人译书，也为平明社这套丛书拉稿。1953年1月给巴金的这封信，就是介绍杨必译稿的：

巴金先生：

兹另册挂号寄上杨必译《剥削世家》，约共四万余字。除请书夫妇代为校阅外，弟亦通篇浏览一遍，略有改动数字，并已征求译者本人同意。该书内容与杨绛所译《小癞子》异曲同工，鄙见将来不妨将该书重版与本书初版同时发行。又译者希望早出版，因其本人将来出仕有关（详情容后面谈）。好在字数不多，轻而易举，可否请宋希信一查平明本年春间出版计划是否可能早出。

又倘尊意认为《剥削世家》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则排版格式可与巴尔扎克各书一律。红笔批注均出弟笔，冒昧之处乞鉴谅为幸。

正文“小引”请先生细阅一遍，若有问题，务请指示，以便修改。勿此致候 傅雷拜上
二十一日

（傅雷1953年1月21日夜致巴金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225页）

杨必（1922—1968）是杨绛的妹妹，信中提到的《剥削世家》是一部小书，她后来还译过萨克雷的那部大书《名利场》，很受推重。虽说初涉译坛，杨必的“师傅”却非同一般：姐夫钱锺书、姐姐杨绛“代为校阅”，一代译宗傅雷“通篇浏览一遍”，《剥削世家》译文质量大有保证，傅雷给出的判断是“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傅雷还向巴金提出一个要求：“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其本人将来出仕有关（详情容后面谈）。”共和国初立，百废待兴，私营出版社（排字房、印刷所）的排书能力很低。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完全按照傅雷的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出书。《剥削世家》，平明社1953年5月初版，印5000册，也就是说在傅雷把稿子寄给巴金之后三个月多一点就印出了。

杨绛在回忆杨必的文章中说：“《剥削世家》《名利场》都是钱锺书帮忙选定的书目并且确定了书名。（杨绛：《记杨必》，《杨绛全集》第3卷第48—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傅雷在给宋希信的信中补充的信息是，这书初译稿，钱锺书不满意，杨必重译了一稿；“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钱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傅雷1953年2月7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206—207页）

傅雷对杨氏姐妹的译稿很是推崇，也曾感叹自己的文字“太死板”，不如杨氏姐妹那么灵活：“这几日开始看杨尔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内若有若无的讥讽。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法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傅雷1954年2月10日致傅聪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4卷第29页）傅雷曾对杨绛说过“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杨绛：《傅雷传记五种》代序），《杂忆与杂写》第320页）看来他是真心喜欢杨氏姐妹的译文。

杨必之外，傅雷还动员宋奇（宋琪）译书，并说：“只要你认为好就不必问读者，巴金他们这一个丛书，根本即是以‘不问读者’为原则的。”（傅雷1951年4月15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195页）傅雷屡次提到“文学译林”丛书，乃是他极为欣赏巴金办出版社这种“不问读者”的原则，其实是为了文学、出版、文化的积累不计名利的气魄。

朋友有各式各样，有的朋友，可能不在于世俗生活中来往多少，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认为傅雷和巴金友情就属于这一类。

“那些忘不了的人与事，就是你的真生命。”如今追忆2018年7月中旬在普林斯顿的短短两日，真如梦境一般，在那闪亮的日子中所发生的一点一滴，都时常在凡俗的日常生活中涌上心头，成为一种温柔而持久的记忆。

记得当时从新泽西去普林斯顿的路上狂风暴雨，朋友马文（Marvin）驾车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小心翼翼地前行着，路上接到陈淑萍老师的来电特意叮嘱我们天气恶劣一定要谨慎驾驶，晚一点到达也没有关系。这老派知识人的周到与体贴让我们心生暖意。即将抵达普林斯顿的那一刻，突然雨过天晴，曾经的忧心忡忡一扫而空，灿烂的阳光在绿意葱茏的森林与草地之间任意挥洒，普林斯顿这个在我心目中神圣的空间如世外桃源般熠熠发光地展现在眼前。

友人兰君教授多年前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毕业，正好与我同一期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此刻正好又回到母校做短期研究。按照事先约定，我们一行五人在拜谒了学界前辈余英时先生后，在兰君引领之下，就细细地游览了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普大是美国最顶尖的藤校，校园建筑的古典与雅致也是有口皆碑的。相对于哈佛的众声喧哗与人来人往、弥漫着一种急于成为全球领导者的精英气质，普林斯顿僻处小镇，静若处子，假期的校园人烟稀少，更难得一见来打卡的中国游客，她以一种遗世独立的贵族气质彰显着自身的存在。兰君引着我们到了她十余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时入住的研究生楼，一座爬满常春藤、铺满青石板的四合院式欧式建筑，更有意味的是地下空间的纵深与广阔，就像一座婉转动人的迷宫一样，功能一应俱全，餐厅、咖啡室、台球室、阅读空间等。在一个天地玄黄的时刻，若有普林斯顿这样一个古典的城堡可以远离人间的苦难与悲情，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不过，若一个人没有强大而独立的精神世界，在这样的古堡里远离故土与亲友读数年甚至十年的书，也是一种艰难的挑战。

晚餐后，友人带着我们在Nassau 街道知名的 Thomas Sweet 冰淇淋店，排队等候品尝了爱因斯坦常常常光顾享受的爱因斯坦之后（貌似是在美国一年吃过的最好吃的甜品），就进入普大校园里闲逛。在普林斯顿那片璀璨的星空下，对故国与乡土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我们眺望着星空，辨识着星座，追寻着童年时光的踪迹。兰君突然想起求学生时代与同学们经常可以在校园里看见萤火虫，于是就起带我们去大草坪寻找萤火虫。

萤火虫，于我也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回忆了，那还是孩提时代在乡下的生活时常可见的，在没有霓虹灯的乡村之夜，那在无尽的黑暗中偶尔闪烁的微弱，往往是来自于夜晚的光明使者——萤火虫，这光自然是脆弱而微茫的，或许可以说是聊胜于无的，但对于黑暗中的夜行者而言，却是一种长久的慰藉。找了好一会也没见到，等我们有点意兴阑珊地坐在校园的长椅上休憩时，萤火虫竟然在低矮的草丛里一闪一闪地出现了，真应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儿子明峻在上海从未见过萤火虫，甚至跟我们假期在湖南的乡下也从未见过，可以想见他的亢奋与痴迷，于是我们四个成年人和一个十岁的孩童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心心念念地寻觅着萤火虫，自在暗处，看一切暗，却又希冀着微光，发现时的惊喜与欢呼、消失时的失望与怅惘，儿时的回忆等各种心情彼此交错，这是一种久违了的生命体验。

我记得很多年前一度特别痴迷阅读梁遇春的散文，他有一篇文章讨论何为天真，大意是儿童的天真是未曾经历世事沧桑和人间苦难的纯真，并不值得特别的褒扬，而那些历尽人间辛酸而仍旧葆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中年人的天真，更难能可贵，是一种真正祛除了世故、算计与功利心的返璞归真的纯粹，正如“赤子其心、星斗其文”的沈从文先生的人生。与其老师弘一法师共同创作了《护生画集》的丰子



普林斯顿大学一角

普林斯顿的萤火虫

唐小兵

恺的名言“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也是这个意思。学术研究也好，文学创作也罢，到了最后比拼的就是一种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否能够抵达一种心无杂念神游八荒的境地。这就取材于普林斯顿的天才科学家约翰·纳什的电影《美丽心灵》所揭示的那样。

第二天，友人兰君领着我们先后参观了主楼、普林斯顿大教堂、儿童图书馆、东亚系和东亚图书馆等。在儿童图书馆停留了一会儿，这是一座设计精巧、藏书丰富且面向社区开放的图书馆，各种设计充满了浑然天成的童趣。比如进门后的两个直立兔雕塑，挂在墙上的普林斯顿大学吉祥物老虎，一个像巨大的树洞（时空隧道）一样的供低龄儿童嬉戏和捉迷藏以及辨认其上的文字与图像的设置。

在一个专门用来阅读与自修的古老建筑，我们细细观摩了彩绘玻璃，据说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工艺。那些精美的图案就那么安静地悬置在窗棂之上，在数百年的时间内静候着来访者或邂逅者。一些假期还留在学校的学生就在这些古旧、便利的建筑空间内静静地阅读、思考与写作，那一刻我想起曾在这里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短暂停留的胡适先生，以及学术生涯的晚年驻留在此地的爱因斯坦。后来又与友人驱车至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参观，在院内湖畔散步闲谈，如今追忆真是“天光云影共徘徊”的一段奇妙时光，科学界的顶顶爱因斯坦人生的最后22年因躲避德国的反犹迫害而流亡美国停留在此地做研究，他的相对论等研究成果成为科学史上的巨大突破，而其在科学研究中所展现的人文主义情怀和道德维度，更是充分彰显了哲人康德所言：“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越是纯粹的思考越能穿越时空，越是纯粹而简单的生活才是合乎道德律的，对社交生活和虚拟世界的过度迷恋无疑是一种现代人的心灵病态。

在我们离开高研院的时刻，两头俊俏而矫健的鹿从面前一闪而过，我们跟踪其后，窥见它们在一处密林深处娴静地站立着，静静地打量着这个自然世界，以及不期而至的访客。这仿若某种神谕一般，给我们这些在世俗的人生中奔波的人传递着某种生命的奥秘。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